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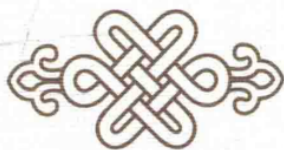
欧亚古典学研究丛书

乌云毕力格 主编

# 五色四藩

多语文本中的内亚民族史地研究

乌云毕力格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欧亚古典学研究丛书

乌云毕力格 主编

# 五色四藩

多语文本中的内亚民族史地研究

乌云毕力格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色四藩:多语文本中的内亚民族史地研究/乌云毕力格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12

(欧亚古典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5325-8522-9

I. ①五… II. ①乌… III. ①少数民族—民族历史—中国—明清时代—文集 IV. ①K2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40461 号

欧亚古典学研究丛书

五色四藩:多语文本中的内亚民族史地研究

乌云毕力格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http://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mailto: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http://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 / 16 印张 25 插页 2 字数 360,000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8522-9

K · 2352 定价: 88.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本书内容的研究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西藏档案馆藏蒙古文档案研究”  
(批准号: 16BMZ018) 的经费资助

# 目 录

|                        |   |
|------------------------|---|
| 绪论 多语文本与内亚民族史地研究 ..... | 1 |
|------------------------|---|

## 上编 多语文本与内亚民族关系研究

|                                   |     |
|-----------------------------------|-----|
| 第一章 明朝兵部档所见林丹汗与察哈尔蒙古 .....        | 13  |
| 第二章 绰克图台吉的历史和历史记忆 .....           | 53  |
| 第三章 康熙二次亲征噶尔丹的满文文书 .....          | 78  |
| 第四章 车臣汗汗位承袭的变化 .....              | 141 |
| 第五章 清太宗与扎萨克图汗素班第的文书往来 .....       | 155 |
| 第六章 康熙初年清朝对归降喀尔喀人的设旗编佐 .....      | 167 |
| 第七章 关于清代内扎萨克蒙古盟的雏形 .....          | 181 |
| 第八章 1705 年西藏事变的真相 .....           | 195 |
| 第九章 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圆寂的真相 .....         | 216 |
| 第十章 噶尔丹与藏传佛教上层 .....              | 229 |
| 第十一章 土尔扈特汗廷与西藏关系(1643—1732) ..... | 254 |

## 下编 蒙古历史地理研究

|                          |     |
|--------------------------|-----|
| 第十二章 清初的“察哈尔国”游牧所在 ..... | 281 |
|--------------------------|-----|

|      |                            |     |
|------|----------------------------|-----|
| 第十三章 | 东土默特原游牧地之变迁 .....          | 297 |
| 第十四章 | 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地之地望 .....         | 305 |
| 第十五章 | 17 世纪卫拉特各部游牧地之分布 .....     | 318 |
| 第十六章 | 日本天理图书馆所藏手绘蒙古游牧图及其价值 ..... | 355 |
| 第十七章 | 清代克什克腾旗的两幅游牧图 .....        | 384 |

## 绪论 多语文本与内亚 民族史地研究

本书以“五色四藩”命名,是因为其内容包括蒙、满、藏等内亚各民族关系和蒙古人文历史地理研究两项之故。16世纪时,随着蒙古人皈依藏传佛教格鲁派,佛教密宗金刚乘在蒙古地方盛行。以青色的不动佛——东方寂静尊为中心的五方佛坛城文化深刻影响了蒙古文化,在蒙古形成了以青色蒙古为中心,白色高丽、红色汉人、黄色回回、黑色西藏四民族环绕的独特的“五色四藩”之说。该说既是蒙古人的民族关系概念,又是民族地理分布概念。因此,“五色四藩”作本卷题目再合适不过了。

### 一

1984年春,我参加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的中国民族史专业研究生录取考试,有幸通过笔试,得到面试资格。面试令我颇感意外,我被叫到报考的导师亦邻真教授和他的同事余大均教授二位先生面前,地点居然是在导师的私宅客厅里。面试的内容让我更加意外:二位简单询问我本科阶段的学习和毕业论文情况后,给了一道题让我书面回答,内容居然是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其中的一个段落译成蒙古文。作为母语为蒙古语的学生和历史系本科应届毕业生,当时我非但没有因为试题简单而感到庆幸,而是在心中萌生了一种莫名的委屈。

在研究生阶段,先生最为重视的一门课就是“民族语文学”,包括音韵训诂、审音勘同、民族文字和汉文互译,甚至还包括民族语文文献的版本目录学、史料学知识,因为该课程的语文学研究文献大都涉及民族语言文字,故称之为民族语文学。读研期间,我到蒙古语言研究所旁听满文课,自学满文,受到先生难得的一次夸奖,而研

究生毕业的第二年,我又被送到中央民族学院民语系学习藏文。跟先生学习后我才悟到,当初他出那样一道题考我,原来是第一次敲他的家门时就想告诉我,为了研读蒙古史,我必须掌握好民族语文,至于翻译的内容他大概随手拿了一本《毛选》而已。

1994年初,我有幸被派到德国波恩大学中央亚语言文化研究所任蒙古语讲师,同时师从魏弥贤(Michael Weiers)教授攻读博士学位。他是继亦邻真先生后对我学术生涯颇具影响的第二位恩师。亦邻真先生的学术路子,简单概括就是语言学和历史学的完美结合,是一位极具天才的语文学家。说来也巧,魏弥贤先生的学术路子和亦邻真先生如出一辙,两位学者的见解颇多相似,只是各自发力的领域有所不同而已。

我在德国读的博士学位是中央亚语言文化学(Sprach- und Kulturwissenschaft der Zentralasien),两个副专业分别为满学和汉学。学期伊始,魏弥贤先生给我推荐了3本书,让我开始专业学习以前必读。这3本书分别为Georg Fohrer等人编写的《旧约书注解》(Exegese des Alten Testaments),Wilhelm Egger的《新约书方法论》(Methodenlehre zum Neuen Testament)以及Bernheim所著《史学方法教科书》(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圣经研究方法论为什么会是研究内亚(德国所说的“中央亚”相当于学界普遍所指的“内亚”)语言文化专业博士生入门时的必读书呢?我感到很困惑。原来,圣经研究方法早已被西方历史学界所借鉴。今日所见《旧约书》的希伯来语(还有阿拉美语,古代西亚通用语)原文在传世的过程中发生了诸多变化,而其转译进程又是一次又一次的变异过程。所以,从希伯来语或阿拉美语源头开始,对《旧约书》进行“流传史”视野下的文本研究,以语文学方法发现流传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异因素,并对各种变化、变异的过程、轨迹和原因做出历史的、批判的解释,最后达到复原《旧约书》本来面貌、揭示变异文本真相之目的。这其实是一个极好的文本综合研究方法。

在导师的指导下,我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康熙皇帝亲征噶尔丹(1696—1698)资料的流传史》[Zur Überlieferungsgeschichte des Berichts des persönlichen Feldzug des Kangxi Kaisers gegen Galdan

(1696—1698)]。在本学位论文中,笔者将清朝宫中档所保留的康熙皇帝的亲笔信等满文档案资料,和官修《钦定平定朔漠方略》相比较,考查原档资料在传世文献中的流变,通过《朔漠方略》对原始史料的取舍、增减、改写、换语境编排和杜撰等手笔的分析,一方面通过原始文献发现、考订和纠正《朔漠方略》歪曲的事实,另一方面力图再现康熙亲征噶尔丹远征的原貌,以此评估《朔漠方略》的史料价值。论文还比较《朔漠方略》的清代满汉文文本,探索经过汉译发生变化的满文原文语境和意境,试图揭示清代满汉合璧历史文献的满汉文本内容之间的微妙关系,进而了解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思维下形成的不同语种译本的不同之处。总之,这是一篇运用圣经研究方法撰写的文献学习作。

本次呈献给大家的这本书的写作,从理念和方法两方面都受益于亦邻真先生和魏弥贤先生二位恩师的语文学研究与文本研究的训练。但其中的错谬和不精当之处,完全是因为我自己生性愚钝,没有体会二位导师学问的精粹而导致的。

## 二

本书上编是内亚民族关系史相关的内容,涉及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和天山北路卫拉特草原等区域的满蒙、蒙藏和满藏之间的政治关系,时间上主要集中在清代前期。

本书探讨内容所涉猎的地理范围和民族成分,首先要求笔者必须利用多语种的文本。因为研究内容的时间维度集中在清朝,满文文献对内亚各民族关系研究的重要性首屈一指。满文资料是清代内亚区域最主要的、最重要的官方史料。在清代,办理内亚民族和地区事务的基本上都是八旗出身的大臣,而清朝规定,满洲大臣办理满、蒙、藏、回等事件时,必须使用满文题奏。到乾隆十一年,这一规定终于制度化。结果,满文书写的题本、奏折、朱批奏折和谕旨成为研究内亚地区和民族的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本书大部分章节,主要是依靠满文档案文献写成的。清朝早期的满文原档、内三院和内阁满文档案、宫中档满文朱批奏折、军机处满文录副档、各地将军

衙门档案等卷宗是满文档案的最主要部分。假设清代相关满文档案没有得以保留,在广袤的内亚地区发生的许多历史事件可能会永远模糊不清或根本不被了解。以《土尔扈特汗廷与西藏关系(1643—1732)》一章为例,1731—1732年,生活在伏尔加河流域东欧平原的土尔扈特人使团借道俄罗斯,路经蒙古高原和清朝内地前往西藏,谒见七世达赖喇嘛,为他们新立的汗王请汗号和印玺。这是土尔扈特和西藏关系史上鲜为人知的史实。通过满文档案不仅发现这一史实的许多内幕,并进而了解到17—18世纪土尔扈特和西藏关系的诸多问题,因而纠正了《钦定回部王公表传》等史书的一些错误,也补充了《清实录》等官修史书的缺载。再以《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圆寂的真相》为例,满文档案充分显示了它的重要价值。关于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最终命运之归宿问题学界历来争吵不休,不少学者认为,1705年六世达赖喇嘛在被解送北京的途中,在青海成功逃脱,来到内蒙古西部的阿拉善地方,以达格布呼图克图名义传教。圆寂后,其转世就成为历代达格布呼图克图,一直转世到20世纪50年代。但是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满文《宫中朱批人名包》中,保存着商南多尔济在康熙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706年2月12日)呈上的一份秘密奏折,内容专门涉及此事。商南多尔济是康熙四十一年起以“住西宁喇嘛”名分常住西宁,负责向清廷及时提供青藏地区蒙藏人等的各种动态信息,协助清廷办理青藏地区事务的重要人物。根据该密折,我们可以基本弄清六世达赖喇嘛的最终归宿。这样的信息只能在清朝宫中满文秘档中才能发现。

因为研究对象的地域不同、民族不同、问题不同,蒙古文、藏文和汉文文本对内亚民族史一些课题的研究都具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而且这些文种的资料往往相辅相成,互相印证。比如,关于明代蒙古人的资料传世者甚少,而明朝兵部题行档中保留了部分相关资料,作为军事情报其可信度很高。通过《满文原档》(也曾命名为《旧满洲档》)、内秘书院满文档案和蒙古文史书,解读这些汉文文书,可以了解17世纪20—40年代南部蒙古集团的一些活动。《明朝兵部档所见林丹汗与察哈尔资料》就是利用满蒙文文献解读明朝汉文档

案文书的一例。《噶尔丹与藏传佛教上层》一章是满、蒙、藏三种语言史料基础上写就的,而去掉其中任何一个文种的资料都会影响论述的全面性。噶尔丹是中亚卫拉特人的民族政权准噶尔汗国的缔造者,因为和康熙皇帝的较量,他的形象在清朝满汉官修史书中早已定格,而在中苏冷战中崛起的中国卫拉特史研究界给噶尔丹新添了民族分裂分子、破坏中国国家统一的罪人等标签。但噶尔丹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五世达赖喇嘛传记等藏文文献,噶尔丹致五世达赖喇嘛、拉穆和乃穷二护法神师等人的信函(满文),以及噶尔丹所写忏悔诗文(托忒文)等文本则反映出了噶尔丹人生中世人未曾了解的一面,充分显示出多语文献对内亚民族史研究的重要性。如后文所显示的,《1705年西藏事变的真相》、《车臣汗汗位承袭的变化》、《外藩蒙古内扎萨克盟的雏形》等内容,都是解读多语种文本的成果。在探讨具体问题时,不同语种史料的作用是不同的,如研究喀尔喀蒙古的车臣汗部时,蒙古文史料起到了主导作用,而探讨清朝在蒙古的盟旗制度时,满文档案显得更加重要,但无论哪一语种资料做“主文献”,同时都需要借助其他语种文本对“主文献”进行阐释和补充。

本书下编为蒙古历史地理研究。历史地理学是一门综合学问,包括历史自然地理学和历史人文地理学以及其派生出的分支学科。本书所谓蒙古历史地理,纯属人文地理学范畴,探讨的是明清时期某些蒙古部或蒙古史相关人物的活动区域,虽然也涉及了历史地图,但并非专业的历史地图研究,而只限于其文字内容,因此这部分的研究仍以文本为基础。

在古代蒙古民族文献中没有像汉地地志类专门的“历史地理”文献,至今所见最早的蒙古文地图也不过是18世纪上半叶的实物。因此,蒙古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历来主要依靠对叙事文献中零散记载的考证。

以文本为基础的历史地理研究,也离不开语文学研究方法。这方面的一个极佳的范文,是亦邻真先生的《起辇谷与古连勒古》(《内蒙古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一文。作者从安葬蒙元帝王之地起辇谷入手,运用元代蒙汉文音韵学,考证与“起辇谷”对应的《元朝秘

史》上的“古连勒古”和《圣武亲征录》上的“曲邻居”，指出它们都是蒙古语山名 kürelgü 的不同转写，波斯文《史集》中则作 KWRL WW。作者证明古连勒古（曲邻居）即元代文献中的起辇谷后，根据《元朝秘史》的相关记载，给 kürelgü（起辇谷）的现在位置定位，指出其应该在蒙古国肯特省曾克尔满达县境内。这是将语文学方法在历史地理研究上用到极致的典范。

17 世纪以降蒙古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就其所需的语言学手段而言，比蒙元时期少了很多乐趣，因为此时蒙汉两种语言发展得都和当代蒙汉语接近，所以语音勘同除个别场合外几乎没有用武之地。但是，主要通过文本信息的基本路子仍然没有发生变化，只是文本信息相对前代增多，因而方法也有所不同了。

本书下编论及的历史地理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是明末漠南蒙古喀喇沁、东土默特部的游牧地考证，第二是清初神秘的“察哈尔国”游牧地的考证，第三是 17 世纪上半叶中亚卫拉特人各部的游牧地考，第四是关于清代蒙古地图文献的点滴。

在蒙古历史地理研究中，北元时期蒙古各部分布的研究比较困难，因为这一时期相关的史料少之又少。对此，日本和田清与我国学者达力扎布做过比较好的研究。自 21 世纪初以来，笔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明朝兵部题行档和满蒙文档案，结合明清时期各种传世文献，发现了明代沿长城一带的几个南蒙古集团——喀喇沁、兀良哈和东土默特人游牧地分布的新资料，这是学界此前所不了解的。《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地之地望》一章，实际上是明代喀喇沁本部游牧地研究。本文以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游历蒙古地方并在喀喇沁地方圆寂的事实为线索，以满、蒙、汉文献记载考订当时喀喇沁部的所在地。对东土默特游牧地的考证主要是在汉文档案、明人边政著作和满文档案的综合研究上完成的。清初所谓的“察哈尔国”是指蒙古末代大汗林丹汗之子额哲亲王所领察哈尔扎萨克旗，因为其地位特殊，清人文献里称之为“察哈尔国”。清初文献里很少提及该旗，其旗游牧所在位置亦不甚明了。本书“察哈尔国”游牧地相关的内容，利用康熙时期理藩院满文题本和雍正时期翁牛特旗蒙古文档案，以可靠的证据第一次弄清了这个神秘扎萨克旗游牧地的四至。

对17世纪上半叶中亚卫拉特各部游牧地分布的研究,主要利用了一位高僧传记。这位卫拉特高僧名叫南海嘉措(1599—1662),号咱雅班第达,在西藏学佛22年后,1639年回卫拉特弘扬佛法,游历卫拉特各部,东自喀尔喀蒙古西部,西到伏尔加河流域,北自额尔齐斯河中游,南到青海,受邀拜访卫拉特各部大小首领,走遍了卫拉特地区。咱雅班第达圆寂后,其一位亲信弟子为他撰写了传记,按年代顺序详细记录了其所访部名、贵族名和地名。这部佛教徒的传记因而成为研究当时卫拉特各部各首领游牧范围、冬夏营地的极佳资料。

关于蒙古地图文献的内容,主要和日本天理图书馆所藏蒙古游牧图相关。众所周知,到了清代,《大清会典》、《大清一统志》、《西域图志》、《蒙古游牧记》等官私史书相继问世,至少从乾隆年间开始,外藩蒙古各旗也陆续绘制游牧图(旗领地图)缴存理藩院,因而清代历史地理的研究比前代变得容易得多了。但是,在这些便利的背后,同时也隐藏着不少陷阱,稍不留意就会上当。笔者关于蒙古游牧图的文本探讨主要基于此。

清代地志文献中的最大问题莫过于地名的错谬。汉语地名是通过翻译蒙古语资料获得的,而因为译者的蒙古语水平有限,译文常常出错。嘉庆、光绪二朝《大清会典》中的蒙古地名,基本上以蒙古各旗游牧图为蓝本,现有游牧图文本和《会典》的对比研究,可以纠正汉文史料的错谬。汉文地志文献的另一个大问题是对蒙古个别旗分四至八达的误载。这是因为利用蒙古地图者未能分清地图方向,因而南北颠倒,东西错位。以往论者几乎无人以怀疑和批判的眼光审视汉文资料中的民族地理记载,不经考证地简单挪用,尤其是张穆所著《蒙古游牧记》一直是清代蒙古地方历史地理研究的手册,在那顺达来博士论文面世前,从未被质疑过。本书以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所藏蒙古地图为例,比较系统和具体地论述了清代汉文地志文献中蒙古地名资料的问题。

### 三

以上主要说明了多语种文本对内亚民族史地研究的重要性。

但是,还必须要进一步强调指出,文本作为史料,其性质、层次和价  
值是不同的。那种对前人留下的所有文本不加批判的“拿来主义”  
和盲目利用所有到手的文本碎片拼凑历史地图的“拼凑主义”都应  
该被摒弃。

前文提及的伯恩海姆《史学方法教科书》(Bernheim: 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是总结西方各种史料学理论,明确提出并  
系统阐述史料二分法的重要著作。伯恩海姆把史料分成两组,第一  
组叫 Überreste(直译为“残余”、“残存物”),第二组叫 Tradition(直  
译为“传统”)。这个看似简单的分类对历史科学具有重要意义。

Überreste 是指那些给人们无意中提供历史信息和知识的,原属  
当时历史事物的一部分而遗留至今的,从其最初形成就不以讲授历  
史为目的的史料,因此笔者称之为“遗留性史料”。该定义的第一层  
意思,是指出这类史料的属性和流传方式,即这类史料本身就是历  
史事件(事物)的组成部分,属于“历史”,而不属于“历史记述”。它  
们或有形(如实物的、文字的、实物与文字合二为一的)或无形(抽象  
形态的)地保留至今,但都是从当时的历史事件中直接遗留下来的,  
其流传没有经过第三者的“报道”、“描述”、“塑造”等中介行为。该  
定义的第二层意思,是强调这类史料形成的原因和目的。它的最大  
特点在于,这类史料的形成不是以记载历史、给世人传授历史知识  
为目的,它形成的原因与诉说历史、记载历史毫不相干。该定义的  
最后一个含义,是解释了它的史料本质。它的属性、流传方式和形  
成的目的都说明,作为史料它是被动的、无意识的,没有受到作者的  
历史思想和价值判断倾向的影响。它们是历史的残存和遗留,是可  
靠的史料。对这类史料首先需要进行的是鉴别真伪。

与它相对的是 Tradition,它是专门以讲授历史为目的,由一个或  
若干个有明确目的的作者(编者)创造的文献。它们是对历史的记  
述,其中贯穿着作者的目的、立场、观点和感情以及编撰水平等诸多  
主观和客观因素,故笔者译为“记述性史料”。“记述性史料”的特  
点在于:第一,这些史料尽量解释历史事件的内在联系,说明因果关  
系和经过。因为它是讲“历史”的。如说“遗留性史料”提供的是历  
史事件(事物)的一个方面或历史过程的一个“点”,那么“记述性史

料”提供的则是事情的方方面面和事件经过的“连接点”；第二，它显得再完整、圆满，也不过是作者（编者）精神机器的产品，是历史的间接反映。因为这种史料是作者（编者）对史实的了解、理解和说明的产物，所以它往往受到作者对史实的认识程度和所采取的态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对这类史料的评判，不仅需要鉴别真伪，还需要判断正误。

两种史料的性质不同，因而对历史研究的意义也大不相同。以“遗留性史料”验证“记述性史料”，以前者评判后者的正误和史料价值，是一种科学的方法。多语种文本的发现和整理是一个重要的步骤，但对它们的利用更是关键的一步，此阶段绝不能采用“拿来主义”和“拼凑主义”，而是一一定要对各种文本先进行史料学批判。

以本书《康熙初年清朝对归降喀尔喀人的设旗编佐》为例：内蒙古各扎萨克旗的建旗年代，主要根据《钦定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的记载为准，而《表传》是以旗扎萨克王公被授予爵位的时间来推定的。本文利用康熙初年理藩院满文题本档案，弄清楚阿巴哈纳尔等若干旗的扎萨克受封爵位时间和建旗年代，明确了扎萨克受封爵位和设旗不是一回事。以往的研究著作因为根据《表传》记载叙述，所以各扎萨克旗的设立年代都显得“清清楚楚”，其实大部分是错误的。目前，因为档案资料有限，还有相当多的扎萨克旗的建旗时间并不能确定，但正因为有了正确的认识，这个缺憾比那个完美更有意义。

本书每章内容都是作者以上提及的文本和史料认识的具体实践，在此不再赘述，如有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上 编

多语文本与内亚民族关系研究